

# 第一章 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源头

历史上，对外贸易是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外联系的确立而产生的，并且伴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而逐步发展起来。研究云南对外贸易史，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源头问题，这是云南对外贸易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探讨云南对外贸易的发生发展，了解早期云南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必须首先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渠道实现的，它的历史源头究竟在哪里？

## 第一节 对外贸易的环境条件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条件下进行的，云南对外贸易活动的展开，便与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多样化的生产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多样化的生产条件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东南连接广西，东部紧邻贵州，北接四川，西北与西藏交界。南部和西南部、西部与越南、老挝和缅甸等国毗邻。

云南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崇山峻岭连绵起伏，河谷纵横交错，大小湖泊点缀其中，平原坝区分布交错。山地高原面积占 93% 以上，平原坝区面积不足 6%。境内分布着六大山

系，纵贯滇西——滇西南、滇东地区。横断山及其余脉盘踞省境西侧，北段高山大河平行排列，自西向东分别为高黎贡山——怒江——怒山——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玉龙雪山；高山部分海拔一般在4 000米左右，河流深切，形成幽深峡谷，落差达3 000米以上。全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致呈梯级分布，礼社江——元江以东以南为云贵高原主体，属高原山地，一般海拔在2 000米左右。滇西北德钦梅里雪山主峰，海拔6 740多米；滇南河口元江河谷，海拔仅 76.4 米。由于海拔高差悬殊巨大，各地区自然植被多样、生态环境各异，自然景观独特。

云南平原坝区主要分散在高原山地之间的滇池流域、洱海流域、曲靖、玉溪等中部一带以及众多的河谷两岸。全省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以上的平坝区约有1 450个，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其中，昆明、大理、蒙自、曲靖—沾益、陆良、昭通—鲁甸6个坝区，面积均在250平方公里以上。云南坝区面积不大，但是，自古以来便是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云南河流分属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南盘江、元江、伊洛瓦底江六大水系。金沙江为长江上游，南盘江为珠江上游。在数条国际性河流中，澜沧江下游称湄公河，流经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入南海；怒江下游为缅甸萨尔温江，入安达曼海注入印度洋；怒江以西的大盈江、龙川江——瑞丽江等各河流属于伊洛瓦底江流域，注入印度洋；元江（红河）下游经越南境入南海。云南河流落差大，上游多为湍急险滩，下游河面渐宽可以通航。除金沙江、南盘江往东流以外，其他的主要河流均往南流出国境，它们曾经是历史上云南通往境外的重要通道之一。

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地区间差异性很大，境内分布着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温暖带、温带、寒温带等不同的气候类型区。由于云南独特的地形地貌，气候变化不仅受

纬度的高低变化影响，同时也受海拔高度的变化影响。由于受海拔高差悬殊情况的影响，形成“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类型和神奇的自然景观。气候的多样性为自然资源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无论是远古时代的采集农业还是文明时代的耕作农业，它的发展都深受这一气候类型的影响与制约。

## 二、古代西南边疆的政区设置

云南地方开发历史悠久，早在先秦以前，云南及其附近地区居住的许多部族，便与巴、蜀、中原地区有了联系。《尚书·禹贡》载，全国划分九州：“雍、豫、梁、冀、青、徐、兖、扬、荆。”西南地区归入梁州。<sup>①</sup>

秦统一中国，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已经更加明朗。当时，分布在西南边境地区的各部族被称为“西南夷”，秦王朝为加强对此一地区的统治曾大力兴修官道，设官治理。《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頰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并在夜郎、滇、邛都等一些地区设置郡县，对地方实施管理。

先秦以来云南地方的开发治理，入汉以后得到明显加强。当时，包括今缅甸、老挝北部和越南全部属于汉王朝统治区域。对此，《汉书·地理志》有详载：公元前 135 年至公元前 109 年，西汉王朝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犍为、越巂、牂牁、益州四郡。其中，犍为郡领 12 县，首邑在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市），地域包括今四川彭山、简阳以南至云南昭通地区、曲靖地区北部及贵州西部威宁、水城、赫章一带；越巂郡领 15 县，首邑在邛都县（今四川西昌市），地域包括今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州、云南丽江地区东部、楚雄州西北部一带；牂牁郡领 17 县，首邑在故且兰县（今贵州福泉县），地域包括今贵州遵义、凤冈以南，贵

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6页。

州黄平、独山和广西天峨、田林、那坡以西，云南麻栗坡、马关、金屏、屏边以北，弥勒、富源和贵州毕节以东的广大地区；益州郡领 24 县，首邑在滇池县（今云南晋宁县），地域包括今云南曲靖地区中部和西部、滇中地区、玉溪地区、红河州中部以西往南至越南莱州西北、楚雄州、大理州往西至保山县东北一带。

东汉时期，云南政区设置大致沿袭前代，但也有明显变化，在原西汉犍为郡领 12 县基础上，东汉时期分北部 8 县属犍为郡，南部 4 县新置犍为属国。特别重要的是又在今云南南部地区置永昌郡，领 8 县，其中 6 县由原来益州郡所辖县划入，2 县由哀牢部落酋长于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内属”时新设置。永昌郡所辖范围甚广，领有今云南西部、西南部以及缅甸北部广大地区。

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采取“羁縻统治”，云南区域分属于几个不同的都督府，滇中、滇东北地区属戎州都督府；滇中以西、滇西北地区属于姚州都督府；滇南、滇东南地区属于安南都督府；滇东北部分地区属于黔州都督府。

南诏时期，云南地方部族首领摆脱中央的“羁縻统治”，搞地方割据，是时，其统治区域包括：“东距爨（今滇、黔连接地带），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境），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西南骠（今缅甸中部曼德勒地区一带），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川东南与黔东北连接地带）。”<sup>①</sup> 在这样广阔的地域，置有十賧、六节度、二都督府。<sup>②</sup> 数十个部族数百万民众在那里繁衍生息。

大理政权时期，云南政区设置依《元史·地理志》载，有 8

① 《新唐书·南蛮传》。

② 《新唐书·南蛮传》。

府 4 郡 37 都，“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郡四、都三十有七。”这些府、郡分别为：永昌府、腾冲府、谋统府（驻今鹤庆县）、会川府（驻今会理县城南）、弄栋府（驻今姚安）、威楚府（驻今楚雄市）、最宁府（驻今文山州）、善阐府（驻今昆明市），善巨郡（驻今永胜县）、东川郡（驻今会泽县）、石城郡（驻今曲靖市西北）、秀山郡（驻今通海县）。

元统一中国，为了管理辽阔的国土，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将全国划分为 10 个行省，云南行省是其中之一，自此云南正式建立行省。行省以下设立宣慰、宣抚、安抚等司，其下又置路、府、州、县。全省共置 37 路、2 府、3 属府、54 属州、47 属县。<sup>①</sup>

明朝建立以后，云南置都指挥使司，旋改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府 58、州 75、县 55、蛮部 6。后领府 19、御夷府 2、州 40、御夷州 3、县 30、宣慰司 8、宣抚司 4、安抚司 5、长官司 33、御夷长官司 2。北至永宁，东至富州，西至干崖，南至木邦。<sup>②</sup>

清末云南省领云南、大理、临安、丽江、楚雄、永昌、顺宁、曲靖、东川、昭通、澄江、广南、开化、普洱等 14 府，永北、蒙化、景东、镇沅、镇边等 5 个直隶厅，武定、镇雄、广西、元江等 4 个直隶州。

先秦以来，云南政区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沿边地区伸缩进退，历代各不相同。这一伸缩进退，给云南对外经济联系带来重大影响。

① 《元史·地理志》。

② 《明史·地理志》。

### 三、先秦云南各民族的经济活动

自古以来，在气候温暖的广阔河谷平原、内陆坝区无疑是最有条件进行农耕活动的经济区域。

从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早在 5 000~3 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代云南各部族先民的主要居住区域和主要农事活动大体上就选择在那些自然条件优越，适宜生产生活的地区。比如，以洱海为中心包括宾川、剑川、祥云、巍山、洱源在内的广大滇西区域，那里发现有大量的早期人类使用的石器，可以肯定是早期人类捕鱼、狩猎、农事活动的主要区域。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也是人类早先重要的农事活动区域。自 1953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滇池周围的官渡、乌龙铺、石碑村、石子村、团山村、石寨山、安宁王家滩、江川头嘴山以及呈贡龙潭山、滇池“蟹屿螺洲”等地发现大量新石器遗址。这些史实表明，洱海之滨、滇池流域是云南先民栖息、繁衍、生产生活汇集之地，成为古代先民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地域之一。此外，如金沙江流域的元谋；滇东北的曲靖、昭通等地；怒江、澜沧江流域也都有大量的遗迹存在。当时，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大都分布在依山傍水、气候温和、林木茂盛的山麓河谷地带，这里不仅便于农作物的种植，也是最便于进行渔猎的场所。很显然，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同时，谷物种植、纺织、制陶等业的发展也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农业生产方面，已经开始种植稻谷、麦子等谷物。洱海区域发掘的遗址中有稻穗、麦穗、稗穗等作物；滇池流域及金沙江区域的遗址发掘中也发现装在陶罐或残留在陶片上的稻谷及稻穗。家禽家畜的养殖已经开始，畜养的动物包括：牛、马、羊、猪等，从现存于某些少数民族中的动物图腾崇拜也能看到这些民族先民的遗风。农业生产上已使用打制的犁、锄等农具。春秋、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出现，金属工具也在生产中使用。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从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都发现大量的青铜用具，其中包括：铜锄、铜斧、铜凿以及其他兵器。这些青铜器具甚至流传到内地的四川、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

手工业生产方面，以青铜制造业最为发达。前述春秋战国发掘的墓地遗址中保存的大量青铜器具，涉及兵器、生产、生活、观赏等不同类型的，种类繁多，工艺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制陶业历史悠久，早新石器时期就能制作各类陶器，剑川遗址发掘，出土文物中就有大量陶器，包括陶网坠、铜范、纺轮、穿孔管子，各类陶片。在洱海区域发掘的其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陶碗、陶盆、陶罐、陶瓮等。纺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各地的发掘出土文物中都有纺织用具的存在。建筑业、木竹制作已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商品交换也应运而生，说明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总之，先秦云南各部族先民的经济活动已经遍及现今云南境内的大部分环境条件适宜的区域，生产活动达到相当的规模和相应的技术水平，人类活动逐步向平原坝区汇集转移。朱惠荣先生在《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综合地理分区》一文中指出：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生产方式等的不同，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生产力布局已有明显的地区分异，并且形成了几个经济发展中心区。它们多位于较为宽广的坝子或河谷，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农业生产比较先进；附近矿产资源丰富，便于矿冶和手工业开发；地处交通要道，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方便；又是内地移民聚居和扩散的中心，成为内地生产技术传播和推广的基地。这些中心是带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也是今天我们认识该地区经济发展程

度的代表。<sup>①</sup> 这里虽然反映的是汉晋时期的基本情况，但何尝不是先秦时代云南经济发展地域格局的写照。

## 第二节 秦汉西南对外经贸交通联系的建立

秦汉以前，在现今的云南及整个西南地区，存在着众多互不统属的少数民族部族，由于他们居住的环境条件不同，获取的自然生产物各异，满足公社成员需求的水平差异很大。而人的需求又是多样性的，为了生存就不得不从更广阔的地域空间获取必需的必需品，于是，交换便这样开始了。先是在相邻的部族之间，进而扩展到其他的部族范围内，通过承传继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种交换关系便确立下来，早期对外贸易的雏形便形成了。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交换关系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存在？

### 一、古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发治理

古代西南边疆地区，在界限上与现今的西南地区有较大差别。朱惠荣先生撰文说，以巴蜀为代表的四川盆地，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特点，开发也早于西南其他区域，向来被视为内地的一部分；吐蕃活动的青藏高原，自然状况独特，自古以来就自成一个地理单元；至于广西，向来与广东自成一体，习称“岭南”或“两粤”，且与交趾相近，又称“交广”，也与西南无涉。直至汉晋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大致包括：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境外的部分区域。<sup>②</sup>

<sup>①</sup> 朱惠荣：《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综合地理分区》，（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sup>②</sup> 朱惠荣：《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综合地理分区》，（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古代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实际上就是对上述地域的设官治理、训导民众、开发经济。在具体实施上，首先是通过政区设置和开辟交通、建立边疆与内地的密切联系来实现的。正如有学者著文指出的那样：“欲知滇缅交通之由来，须以追溯秦汉间川滇之贸易通道为其权舆。盖因当时西南夷中之滇国昆明，固一面交通印緬，一面交通巴蜀，而为其中枢也。”<sup>①</sup>由此可见，交通的开辟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治理何等重要。

古代中国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据后世学者研究认为大体上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即荆楚向西拓展，巴蜀向南开疆，支撑开疆拓土的物质基础是商贸活动，滚滚而来的商机汇集于昆明，冲击西南地区，影响着与西南地区相邻的境外国家和地区。

据史籍记载，楚国远在春秋中期以后就曾不断向古云贵高原开拓疆土，建立交通，使之实际成为楚国的西疆。今云南东部曲靖、富源、陆良、寻甸一带，为古劳浸、靡莫居地。<sup>②</sup>《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国“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徐中舒先生谓其首领都是楚国贵族。<sup>③</sup>这些贵族与楚的关系如何，今云南陆良县境的刘宋《爨龙颜碑》有记述。其碑文谓爨氏是“颡頠之玄孙，才子祝融之眇胤（苗裔）也。”并谓爨氏先人曾“霸王郢楚”，“诏德于春秋”的令尹子文是其祖宗。这一带的濮人、劳浸、靡莫及爨氏因与庄蹻为同族，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与滇国“皆同姓相扶”。<sup>④</sup>《汉书·西南夷列传》则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楚威王（前

夏光南：《中印 緬道交通史》，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初版，第 6 页。

<sup>②</sup> 杜预：《春秋释例》（《左传 文公十六年》《疏》引）及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其为濮越或百濮。

徐中舒：《夜郎史迹初探》，《夜郎考》（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0 月版，第 200 页。

339~前 329 年)时,楚庄王苗裔庄跻,循长江略巴郡、黔中以西,占据滇池区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地平,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为长久计,变服,从其俗,以长之。”<sup>①</sup>庄跻入滇为滇王,独有一方基业,更使楚国势力达于滇池区域。汉时滇国统治者仍为楚王族的后裔,故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十分肯定地说:“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还说夜郎之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正义》谓:“靡非在姚州北,……即靡莫之夷”。此“靡莫之夷”的靡非,亦本江汉濮人。<sup>②</sup>从地域范围来看,靡非即今云南楚雄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北抵金沙江两岸,南及礼社江。<sup>③</sup>

地跨滇南、滇西南和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的古哀牢国与楚的关系又如何呢?是时,古哀牢为一民族部落的旧称,与“夜郎”、“滇”、“邛”相类似,也已进入奴隶社会,具备了国家形式的政权组织,故称其为国。其地相当于今天保山、德宏、临沧、怒江、思茅、西双版纳和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广大地区。<sup>④</sup>由此可见,古哀牢地处控扼云南交通南亚、古印度洋之咽喉,其地与楚人曾经经营过的滇东广大地区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与楚的联系也是可以肯定的。

从上举史料来看,楚国在古云贵地区确实进行过历次开拓,并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至于其势力所及,据研究,到楚后期,其西疆达于今哀牢山脉南北,其北在古靡非

《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

②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00、201页。

此从方国瑜之说,详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

④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22页。

附近的金沙江畔，甚至可能抵达蜀之邛崃山麓。<sup>①</sup>对于这样辽阔的西域——古云贵地区的开拓，与楚国腹心地带荆州地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经济联系？还得从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中寻找答案。具体来讲，这种联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黄金的东运，二为楚丝的西来。从史籍记载来看，荆州不产黄金，然而楚国却实际拥有大量黄金，成为其金融支柱和兼并之资。楚国还是当时最先采用黄金铸币的诸侯国，其数量很大，种类繁多，如郢爰、支爰、陈爰、融爰、卢金、鼈等等。其实物在湖北、陕西、安徽、河南等省均有发现。<sup>②</sup>楚国黄金来自何处？其答案就要在楚国控制的广大疆域中寻找。自古以来，云南是一个重要的黄金产地。《韩非子·说言七右经》说：“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这里的“丽水”即指云南境内之金沙江，为当时靡莫的属地。哀牢所在的澜沧江亦产黄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哀牢地“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博南县，“西山高40里，越之，得澜沧水。有金沙，以水洗取，融之，为黄金。”这些地区的黄金，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得到了开采。这些黄金开采后便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其中也包括郢都，从而充实着楚王国的国库。正因如此，楚国虽不产金，却有大量的黄金用作货币流通天下，作为财富用作交通诸侯、兼并天下的资本。<sup>③</sup>

楚地是古代中国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楚向西南开拓疆土，开采黄金的同时，也把丝运入西域，从而形成了荆楚与云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02页。

<sup>②</sup>《考古》，1973年第3期，1977年第2期；《文物》，1965年第1期，1977年第1期，1980年第10期。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86页。

贵两地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不惟如此，楚丝在输入云贵地区的同时，而且还经滇池地区转输缅甸及印度一带。在古印度文献中有 Cina 一词，据季羨林先生著文说，Cian 就是“脂那”，“支那”即中国。<sup>①</sup>季羨林先生还在其《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从古代蚕丝的发现，蚕丝在西域传布，蚕丝在西南的传布以及蚕丝输入印度的过程等考察入手，肯定了中国内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然后经滇缅通道转输到了印度的基本事实。另据苏仲湘先生《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一文旁征博引，认定“支那”一词指楚地无疑。<sup>②</sup>荆楚能为古印度人所熟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存在着经济联系。

楚国开拓西疆——古云贵地区，除了经济上的联系外，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也是很重要的。较具代表性者有如铜鼓、玉器、方珣铜斧、靴形铜钺、喇叭形茎首一字格短剑、铜镞孟、铜葫芦笙及丝织品。从滇池和荆楚两地区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他们之间都具有显著的渊源关系。<sup>③</sup>

## 二、西南地区对外经贸交通联系的建立

巴蜀对南中的经略开发，其历史也十分久远，而且在地缘上更直接，交通联系也更加频繁。据史家研究，古代四川交通云南以及假道云南交通现今之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其所取用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五条：零关道、五尺道、南夷道、滇越进桑道、滇缅印永昌道。这些交通路线从不同的方向向南、向西南辐射，进入云南以后，便与云南境内各民族地区的交通网络衔接，最后通向遥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5月版，第76页。

② 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04~209页。

远的国境线以外同世界相连。

——零关道 零关道是古代川滇交通的一条重要路线。晋代左思《蜀都赋》称杜宇王时“廊灵关而为门”，常璩《华阳国志》称杜宇时“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杜宇执政时代，约在春秋之世，或西周之末，即在公元前 8 世纪时。<sup>①</sup>也就是说，公元前 8 世纪时，蜀国便以零关为门户，南下与滇南及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相互交往了。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通的零关道，秦代已然通达。《史记·司马相如传》称：“邛、笮、冉、陇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汉初欲通西南夷古道，因“费多，道不通，罢之。”<sup>②</sup>到元光五年（前 130 年）司马相如“略定西夷，邛笮、冉陇、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隘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悦”，秦末汉初闭塞的古道又复通畅起来。元狩元年（前 122 年），汉武帝派遣使者间出探求通身毒国的通道，其中所走的一条路即是灵关道。元鼎六年（前 111 年）司马迁也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sup>③</sup>元封二年（前 109 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遂设益州郡。<sup>④</sup>元封六年（前 105 年）汉兵降服昆明夷，又设叶榆等数县。至此，零关古道的梗阻尽除，道路得以畅通。商贾便沿着此路贩运笮马、僰僮、牦牛以及丝织品、铁器、其他金属制品和食盐，借以谋取巨利。

——五尺道 历史上从巴蜀取道朱提滇东北地区到达滇境的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文中，就持此观点

② 《史记》卷 123 《大宛列传》。

③ 《史记·太史公序》

④ 《汉书·西南夷传》

交通路线，因有秦“奋六世之余烈”，展拓疆土，开发西南夷，派常頡略通五尺道之说而称为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頡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笮马、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秦末汉初战乱不已，边疆事务废弛，古道一度闭塞，出现“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的情况。汉兴，恢复古道交通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高后六年（前 182 年），汉便正式在今宜宾西南设置僰道县，为修复古道、经略西南事务奠定了基础。武帝即位后，派唐蒙开辟南夷道的同时，又令其沿五尺道路线开辟“西南夷道”。

从秦代五尺道到汉晋西南夷道的开通，又把巴蜀与南中东部广大地区联系起来。这条道路的开通从政治意义上看，它使中国边疆第一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开郡县，设官治理，不仅为王朝统治云南、实现政治上的一统创造了条件，而且与“巴蜀民”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这条道路成为“巴蜀殷富”的重要源泉。正因如此，尽管汉初政府曾以极其严厉的行政命令“闭蜀故徼”，也无法阻止商贾在巴蜀与西南夷之间的贸易，奴隶贸易的丰厚利润驱使着巴蜀商人甘冒违法之险“窃出商贾”。至于巴蜀与南中的贸易，其所取给的商货，购入者有笮马、僮；输出者多为丝织品、金属器及食盐等物品。

——南夷道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 135 年），番禺令唐蒙受命出使南越，回到都城长安后报告了他的重大发现，即从巴蜀经夜郎沿牂牁江有秘密商道可通番禺的情况。汉武帝闻知此事后，当即派唐蒙经理“通夜郎道”事宜，这便成为汉朝开发南夷道的直接动因。唐蒙领命后，先取符关道通夜郎。但此路不理想。元光五年（前 130 年），发巴蜀治南夷道”遂改由僰道循牂牁江入夜郎境。修筑南夷道的起因，《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甚详：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蒙乃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军，将千余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作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军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问题是“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其道是否已通？道路显然是修通了，并且开通的道路不只一条。前文提到，建元六年置犍为郡时，郡治设在位于夜郎东境的犍县（今贵州遵义市西），说明自巴蜀已有通夜郎的道路，否则郡治就不可能孤悬在犍县。至于“夜郎临牂牁江”一语中的“夜郎”，应在今天的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一带濒临北盘江和南盘江的某个地方，牂牁江也就泛指北盘江和南盘江无疑。自陆路转道南北盘江无疑是可以浮船入番禺的。

——滇越进桑道<sup>①</sup> 西南地区与越南的往来，见诸史籍记载者，是从有关安阳王建立瓯雒国的传说中开始的。《史记索隐》载：“《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

参见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交通概论》及蓝勇：《南方丝绸之路》两文。

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蜀王子至交趾建国之说，见于记载者，除《史记索引》之外，《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太平寰宇记》卷 170 岭南道十四《交趾县》条、《岭南摭怪》之《金龟传》、《越史略》卷一《国初沿革》、《大越史记全书》外记卷一《蜀记》、《越史通鉴纲目》卷一等中越史书都有类似的记载。蜀王子并文郎，建瓯貉国的时间，《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一《蜀纪》及《越史通鉴纲目》卷一都说周赧王五十八年（前 257 年）。前书说：“甲辰，元年（原注：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貉国。”后书说：“周赧王五十八年，蜀王既有文郎，改号曰瓯貉，都封溪（原注：旧史，王姓蜀讳泮，巴蜀人也。时王既并文郎，乃改国号曰瓯貉，都封溪）。”蜀王子生活的年代在公元前 3 世纪，从有关史料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认定：最迟在公元前 3 世纪初年，蜀与交趾已有交通联系，南中是其必经之地。滇越交通也当在此时开启。

——滇缅印道 滇缅印永昌道是直接沟通西南与缅印之间的陆路交通线，是被后世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路段。官道的兴修，是元狩元年（前 122 年）张骞通大夏，见蜀布、邛竹杖，还报天子之后的事。至于民间商道，当在张骞通大夏之前，即在公元前 122 年以前就早已存在。

滇缅之间，山水相连，在这广阔的地域之上有一个古老的哀牢国。《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该志还称：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与哀牢国相邻者，南边是境外的缅甸一带，北边是昆明部族，其位置相当于今大理、保山之间。昆明与内地巴蜀、荆楚的交往早于公元前 4 世纪就开始了。古哀牢国就位居内接巴蜀、荆楚，外接缅甸、印度成为古代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经济文化交融的中介地带。

古代缅甸两国，地域相接，商业和文化交流方便。缅甸交

通，有确切记载的年代，始于印度佛教创始的公元前 6 世纪。<sup>①</sup>佛教创立之初就传入了锡兰和缅甸。稍后，印度进入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即阿输迦，前 273~236 年）统治时期，王国东部已抵达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包括迦摩缕波（今阿萨姆）及孟加拉的广大地方。为了促进同外部世界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孔雀王朝便以佛教的传播为先导，派出大批高僧到外国传教，缅甸便是印度佛教影响最大的国家，从而奠定了缅印间最为坚实的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也正是在孔雀王朝时代，中国西南经缅甸通达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正式开通。<sup>②</sup> 见证于印度史籍者，便是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阿育王之祖父）的宰相乔底利耶（Kautilya）《政事论》所谓“产自支那成捆的丝”的记载。<sup>③</sup> 这一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云南。

汉兴，汉武帝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道”一时受阻，但并未停止继续打通商道的努力。汉武帝决心既定，便兴师动众，以讨伐阻道的昆明及劳漫、靡莫诸部，并得到滇王的协助，终于把道路打通了。但滇缅路段真正通畅则是到了东汉永昌设郡以后，对该道路的记载也多集中在东汉之后各代。这条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通道，自中国荆楚、巴蜀多路汇集于滇西叶榆，入哀牢，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跨越伊洛瓦底江上游绵延的崇山峻岭，抵达印度国境。当时的商贾贸易，可以肯定是一种长距离分区段进行的中转贸易。各种商货经过上一部族流向下一部族，在国家观念、领土意识都十分薄弱的古代，商品流通也

杰里·巴勒克拉夫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TimesWorldHistory），三联书店，1982年，第82-83页。

② 致力于荆楚文化研究的张正明教授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于周代，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比汉代北方“丝绸之路”至少早200年南方丝绸之路东起楚国都，西抵印度孔雀王朝都城华氏城，途经长沙、贵阳、昆明、缅甸

③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5月版，第76页。